

人文学、古典学、神学

——第八届“神学与人文学”

暑期国际研讨班会议综述

Liberal Arts, Classical Studies and Theology:
Review of the 8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陈叙

CHEN Xu

作者简介

陈叙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Xu,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xchend@sina.com

Abstract

The Eigh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 Humanities was held in Suzhou from August 28-31, 2012. The Summer Institute was co-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The theme of the 8th Summer Institute was “Liberal Arts, Classical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Resources”. Ten distinguished scholars from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UK),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Lafayette College (USA),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ttended the Summer Institute and gave lectures to young Chinese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Nearly 50 young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30 universities submitted papers and participated in i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y the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ries to present the main themes,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ummer Institute.

Keywords: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Liberal Arts; Classical Studies; Theological Resources; review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于2012年8月28日至31日在苏州举办了第八届“神学与人文学”国际研讨班，主题为“人文学、古典学研究及神学资源”。此届研讨班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耿幼壮教授主持，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共有近60位学者提交论文并参与讨论。来自北京大学的赵敦华教授、香港浸会大学的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的罗兰·博尔（Roland Boer）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焯昌教授、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特雷弗·哈特（Trevor Hart）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大卫·贾思柏（David Jasper）教授、台湾中原大学的曾庆豹教授、美国拉斐特学院的埃里克·齐奥尔科夫斯基（Eric Ziolkowski）教授、英国斯特林大学的安德鲁·哈斯（Andrew Hass）高级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的耿幼壮教授应邀发表大会主题演讲，从“批判”、“否定”、“回归”等诸多方面析毫剖厘人文学、古典学与神学。诸场报告颇具创见，极富启发，特综述如下。

一、“批判”古典学

现代古典学多指关于古希腊罗马文本的语文学研究（philology），而这一学科在诞生之初却专针对中世纪“学问”（doctrine）的批判艺术。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在题为《古典学与宗教改革》的报告中举例阐明以上观点，比如，最早将人文学研究方法用于《圣经》的校勘研究并主张宗教改革的是现代拉丁文古典学创始人瓦拉（Lorenzo Valla）和希腊文古典学创始人爱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路德与爱拉斯谟的“《圣经》启示是否服从古典学的考察”之争，争论焦点为：1、《圣经》的文字意义是可疑

的还是确定无疑的？2、《圣经》解释的权威是希腊人还是上帝自身？3、人何以能够确信上帝的启示？赵教授认为，前者终因轻视古典学考证而无法长远影响学术思想，后者则以古典学的回答奠定了后世圣经批评运动的基本立场。曾研习古典学的加尔文不仅能利用其丰富的古典学知识解释《圣经》，而且可以据此驳斥违背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在赵教授看来，古典学这一原初的批判姿态，衍生出《圣经》解释中的高阶批评（High Criticism），孕育了天主教“理性成全恩典”的传统，确定了信义宗“启示在《圣经》批评之中”的走向，并促成了改革宗“无误的启示与可错的解释相一致”的信仰。在葆养古希腊—罗马文明之外，古典学对于神学的批判可视为一种“反转”的葆养。正是这种“反转”的使命，古典学的发展才具有更多面向和可能。

香港中文大学李焯昌教授的《经典之形成与诠释：重读希伯来圣经之创世与洪水故事》恰可为赵教授的报告做注脚——用古典学的方法进行《圣经》解释的高阶批评。李教授指出宗教经典之形成源自生活、言说、书写。他以《希伯来圣经》为例，说明何谓开放性的宗教经典。许多人认为一神宗教的正典如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基督教的《新旧约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等，自写定经本及确定为正典之时，经典即已关闭，文本之阐释也被固定为金科玉律，不可删改。但《希伯来圣经》向我们展示：宗教正典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从未将文本阐释之路封闭，其文本之适应性、可塑性及开放性，仍然随处可见。

李教授在演讲中示范如何将传统教义放下，用文本中（what is in the text?）、文本后（what is behind the text?）、文本前（what is in front of the text?）三种取向解读（Close Readings）《创世记》第1至11章，探讨洪水神话的意义。首先思考：《创世记》中有几个洪水故事？上帝的名称在叙述中的改变？诺亚几次被要求建造方舟？到底有多少动物被带入方舟？……进而说明《创世记》洪水神

话的不同源头（比如《阿特拉哈西斯》和《吉尔伽美什史诗》），不同的底本之间有矛盾也有衔接。最后，得出结论：《创世记》洪水的叙述者在模仿和搜集各种古代近东洪水神话的同时，将其重新组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意在重构以色列的民族身份。

由此，李教授尝试用“跨文本阅读”的方法开放《圣经》文本的阐释之门：基于读者的多元经典处境，结合本土文本（亚洲文本）与外来文本（《圣经》文本），比如，在中国的思想语境中阅读《圣经》。合观中国丰富的洪水故事（多达 568 个版本）与《创世纪》洪水神话，可发现中西文化的一致之处。李教授认为只有结合本土的经典资源，吸取佛教本土化的经验，《圣经》的东方之旅才会更为顺利，否则仍不免被视为西方经典、外来宗教。

李教授的演讲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神话和历史并非虚幻和现实的对立。在古代编史中，神话的历史化或历史的神话化非常普遍。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罗兰·博尔教授在演讲中也强调了神话的二重性：虚构（fiction）、深层真理（a deeper truth）。其《论古典主义之神话》（On the Myth of Classicism）关注的是“古希腊经典乃西方文化之根”这一神话（myth）是如何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被建构的？这一神话缘何得以建构？博尔教授指出为寻求基督教神学之外，独立于东方（埃及、印度、中国）的源头，欧洲开创了以进步、理性、民主的古希腊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学科。这一学科的设置，不仅有助于西方世界“研究自身，解释其自身功能，更好地把握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将原有的学科从神学与教会手中解放出来。古典学一经设立，西方文明之根不再是《圣经》与神学，取而代之的是古希腊经典；上帝带给人类的原初启示不再是基督神学，取而代之的是古希腊哲学。神学与整个西方文明必须在古希腊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由是，通过替换历史、更新叙事，晚于东方登上世界舞台的欧洲终于在 19 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在他看来，重寻西方文化之根的努力可谓一个神话——虽事出虚构，却

又揭开了深层真理。深层真理究竟是什么，博尔教授在演讲结束时指出：深层真理就是西方文化之根原本在西方世界之外（穆斯林世界、非洲甚至中国），创建面向古希腊的古典学学科实乃对西方文化的背叛。

此外，香港浸会大学的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在题为《人文学、古典学及神学资源：现当代跨文化处境下的诠释个案研究》（*Humanities, Classics and Theological Resources: Interpreting Case Studi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ross-Cultural Contexts*）的演讲中，以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三位中国经典的外译者为例，从出版历史写作学（grammatological）的角度分析理雅各的汉学古典译作，并据此对比三人的翻译及出版情况。费教授在演讲中从“选取、使用权威、标准的汉文版本”、“使用标准译音、特殊声调记号”、“用数字给权威文本的内容编号”、“双文之下又作评注”、“对传统注疏的研究”、“疑难之处，予以批判性解读与意译”、“在评注中提供不同翻译”、“对引文出处的准确定位”、“探索不同的译法”、“进行儒耶比较方面的分析”、“寻找诠释原理”、“制作带注解的参考书目”、“参考文献中透露欧人的有关研究”、“为‘古典汉语术语’造辞典”、“为所有经典做索引”等 15 个方面呈现理雅各如何为汉学译作树立标杆。

西方的古典学在创建之初便以批判姿态参与《圣经》解释，使其逐渐从封闭的宗教正典身份中抽身而出。古典学不断批判且葆养《圣经》研究，传教士汉学家进而兼采两种研究之长，以译注中国经典的形式，补充并发展东方的“古典学”。时至今日，《圣经》解释更抛开传统教义，吸取他山的本土化经验，结合东方“古典学”以达成“跨文本阅读”。这条学术发展之路也许蕴藏着某种有待发掘的深层真理。

二、“否定”人文学

古典学是人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对于神学（Theology）而言的人文学（Liberal Arts），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情感、道德和理智。英美学术界近年兴起的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实践，其诉求之一就是利用“更优质的分歧”在和谐、平等、自由的对话中实现人文学的一大鹄的——培养公民品德。

与之不尽相同，杨慧林教授将经文辩读与“中国处境下的文学与宗教跨学科研究”联系起来，视之作为一种深刻的、超越“宗教”本身的跨学科实践。这种经文辩读更为开放地批判形而上传统——西方宗教和神学概念本身。杨教授认可并赞扬西方传统中的“否定的思考”，受此启发，英国斯特林大学安德鲁·哈斯基基于否定诠释学的方法，在题为《否定的诠释学与“经文辩读”》（Negative Hermeneutics and “Scriptural Reasoning”）的报告中讨论中西两种经文辩读方式之间的差异。

在哈斯看来，现代以及后现代对形而上学的挑战激活了西方哲学与文化思考的否定传统。否定的思想在亚伯拉罕信仰传统中隐约可见：《创世纪》中上帝自混沌创造世界。《传道书》中智慧的虚空色彩、《腓力比书》中基督自我倾空式的虚己。然而，中国以及大部分希腊影响之外的东方传统中却并非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关于“无”、否定和悖论的思想。阴与阳相互交融，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比如，《道德经》云“正言若反”、“无中生有”、“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若以“道”取代“理性”或“思辨”（Reason），“经文辩读”这一名称将富有不同含义。这种“Scriptural Tao-ing”也将引出一整套不同的预设前提、质疑和文化实践。

哈斯认为以西方哲学、神学和批评思想整合否定的思想，可使“否定”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中发挥作用。黑格尔是第一位肯定否定之作用的现代哲学家。他的著名术语“奥伏赫变”（Aufhebung，

扬弃)，描述了对立元素交互依存（cohere）的过程。对黑格尔来说，唯有通过否定的手段过程才能推进。否定一直且永远在运作，永远鲜活，即便它成为一种反对自身的否定力量，一种否定之否定。不少当代思想家如德里达、阿冈本和齐泽克对黑格尔的重新思考多少与否定有关，他们将黑格尔的否定看成其“体系”的本质，试图解答纠缠西方理性主义很久的困惑——否定究竟有没有任何“肯定”的作用的可能性。

以法国思想家南希为例，哈斯接着分析了其对奥伏赫变的解读。南希认为奥伏赫变总是在自我批评、否定又肯定（sich aufheben），也就是说，这个词也运作于自身，总是扬弃自我（self-sublation）。它不断从自身滑走，在接近自我的同时疏远自我。这意味着它在任何文本、任何话语系统中起着大破坏者的作用，通过清除文本和篇章的含义空间来制造断裂。奥伏赫变不是庇护荒谬，也不是弃绝意义，而是在消耗（exhaust）含义。奥伏赫变有可能运作于西方宗教内部，特别是基督教内部。它从内部解构一神论和基督教，但这并非上帝或者基督教的终结。南希指出在现代性晚期，通过不断自我扬弃、辩证地运作奥伏赫变，西方的上帝或者宗教有必要敞开自我，朝向一种不同的信仰和希望，不再需求一种需要确定性基础的、形而上的担保人和被担保人。

因此，要求新的信仰和希望的经文辩读并非一种有神论或无神论思辨，而是一种被哈斯称为诠释学的跨学科思辨。因为，在否定现身之时，意义不断被消耗，然而否定并不止于消耗，还会引发灵感。否定的诠释学是一种压迫和保留意义的吸纳与吐出，消耗与激励并存的联合。在他看来，黑格尔和南希所主张的奥伏赫变之下的“思辨的理性”，更接近“道”，而不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或者启蒙传统的理性主义。可以说，否定诠释学是一种“道”的诠释学。

卡尔·雅思培尔斯（Karl Jaspers）将公元前 800 年至前 200 年人类空前的创造性时期定义为轴心时代（axial age, die Achsenzeit）。

据此，有学者将我们这个时代诠释为“第二个”或者“新的”轴心时代。美国拉斐特学院埃里克·齐奥尔科夫斯基教授在《轴心时代、比较的时代及宗教与文学之比较研究》（*The Axial age, the age of Comparis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terature*）的演讲中认为这一比附似乎不妥。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之所以成立，正因为当所有那些“突破”（*Durchbrüche*）齐头并进之时，某种全球通信和网络系统并不在场，而界定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的恰恰是它们的在场。齐奥尔科夫斯基教授提出两点意见。首先，最重要的经文几乎都产生于轴心时代，因此轴心时代理论将为杨慧林教授的“经文辩读”式的跨学科研究（神学、宗教、文学）提供丰硕的基础；其次，应定位我们的时代为“比较的时代”。通过探讨轴心时代、“比较的时代”以及宗教和文学的比较研究，齐奥尔科夫斯基教授进一步分析比较文学与比较宗教学的历史与现在的神学困境，指出比较主义在 20 世纪从寻求相似性转移到强调差异性，分裂自我以与“他者”艰难对话，然而，对于宗教和文学的比较主义研究来说，最好的道路也许在“世界犹如他乡”与“无人是陌生人”——相克相生的差异与相似——他者与自我的模糊边界之间。

《瓦格纳事件》是尼采写于 1888 年的一本小书。尼采在书中将过去好友瓦格纳视为一个“事件”，否定他及其代表的浪漫主义，认为瓦格纳的颓废音乐是欧洲近代文化疾病的症状。“瓦格纳事件”同时也是尼采对自身的一种否定，有学者视之为“我们历史的必要转折”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在题为《诸“瓦格纳事件”——音乐的审美—政治学》的讲演中指出，经过一段时间的“遗忘”之后，自 199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思想界似乎使瓦格纳再次成为一个“事件”，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发表看法。为回答作为“事件”的瓦格纳何以不断成为论争对象以及这一“事件”的人文学、宗教学蕴含，耿教授逐一介绍了参与这一“事件”的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拉孔-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巴丢(Alan Badiou)、齐泽克(Slavoj Zizek)诸家的观点。

在诸“瓦格纳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音乐与否定性哲学之间的关系。例如,法国哲学家巴丢在《关于瓦格纳的五个问题》的第二章中,就详细讨论了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涉及的非同一性经验、身体、苦难、奥斯维辛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如果奥斯维辛之后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非同一性的哲学,一种否定辩证法的哲学”,那么,音乐在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境遇中,同样也必须具有这样一种否定性,也必须摆脱同一性的支配,必须全然处于差异和转化之中。这就是所谓的“musique informelle”——一种破碎的音乐。诚如尼采的贬抑,瓦格纳的音乐就是这种破碎的音乐的先驱。齐泽克则指出瓦格纳所做的一切是在试图释放卡在喉咙之中的声音,摆脱无法将自身外在化的焦虑。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指明瓦格纳所开启的是一条抛弃音乐本身的道路——彻底打破和推翻传统调式音乐。现代音乐通过各种手段所努力尝试的正是这种“瓦格纳之路”。诸种尝试颇为有力地呈现了上述无法摆脱的焦虑。齐泽克的洞见在于:现代与传统之间差异的无限延异彻底否定了形而上学那不断返回自身的统一性概念,从而也就拒绝了与大他者之间的对话和联系,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不仅是瓦格纳,就是其最激烈的批评者尼采自己也未能坚持这一立场。……即,其没有能力接受大他者之不存在”。

自我与他者之别是比较的基础,却又是它的障碍。人文学在致力于观察、分析及批判人类的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同时,其附属工作之一就是在不断的比较之中,肯定或否定人类的参照物——大他者的存在。对于逍遥乎“无”与“道”之间的中国文化而言,大他者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人文学发展至今,几经中西碰撞,是否有助于人类提高——接受这个无所不在的大他者的不存在、勇于拒绝与之对话和联系——的能力?抑或只有运用“道”或者奥伏赫变

之下的“思辨的理性”，扬弃自我，甚而否定人文学本身才能否定大他者的存在？否定人文学的后果是什么？可能是，回归神学吗？

三、回归神学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大卫·贾思柏教授的主题演讲《重返神学思考》(Returning to Thinking Theologically)以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的《庄子之道》(1965)为例,说明植根于信仰的话语在全然不同源的话语中寻求相似或“模仿”,这正是所有真正的跨学科行为的本质。贾思柏教授指出学者、专家,或者宗教人士,甚至政治思想家,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假定自己毫无文化上和智力上的准备,进而勇于在既无知识又无经验的语言、哲学思想、本体论、音乐领域中发现和谐。与抽象相对的文学形式(比如《庄子》与《圣经》中的寓言、故事、谜语或历史记述)通过神圣而又恍惚稚愚的论点,旨在激发思考、动摇假设、挑战理性与常识,尽管在其思想深处潜藏的其实是强硬而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这就是默顿认为《圣经》的《传道书》与中国的道家经典最为接近的原因之一。默顿对庄子的思考将我们引向一种更为根本的思辨方式,即反观自身,这种思辨方式也存在于《圣经》预言式书写,以及神秘主义传统之中。它要求抛弃二元对立以及价值、洞见、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反对善恶、是非之分,比如,庄子“朝三暮四”故事中的“圣人和之以是非”,又如老子那句貌似悖论的名言“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贾思柏教授认为基督教思想家莫尔特曼和汉斯昆太过宗教化,以至不能保持恰当的神学逻辑。实际上,正如《以赛亚书》所示,只有当作为前提的信仰被抛开时,真正的共通性才得以恢复,这种恢复虽往往表现为“反转”(perversity),但实际上却形成了更深刻的神学逻辑,其中“神的地位”(the status of the *theos*)至少成为

严肃的辩论问题。借助这种神学逻辑的恢复，我们开始回归古代文本——《希伯来圣经》和中国经典，二者拥有近似的古代传统，它们的智慧和推理模式也许并不相距甚远。由是，贾思柏教授以道家的“无为”（并非根本不活动，而是合于天地之道的“完美的行动”）比对希伯来先知的思想——雅威的在场/缺席以及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上帝既是一切也是虚无”（everything and nothing）之说。当齐泽克式的左翼思想家的“反转”作品与古代中国的智慧相遇之时，一种更加古老的理性真理被偶然瞥见，这种理性真理果真能拯救当代政治、伦理困局？古代中国的文学与哲学与古代希伯来经文中的智慧几乎发源于同一历史时期（约公元前 800-200 年）。每一种文化各有一种深刻的神圣感。然而，这就是孔子与以赛亚的水火不容之处吗？上帝一直就是那个问题吗？或者经文辩读有赖于一个悖论，或许是一个“反转”，即基督教所说的上帝之死、上帝缺席，这一“反转”是否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出现在庄子的吊诡和令人炫目的文字游戏中？在提出以上问题后，贾思柏教授给出结论：抛开信仰的前提，恢复神学思考对于东方和西方都十分重要。追随庄子，追随以赛亚的雅威，从弱思想的哲学的开始，回归神学。

回归神学是西方学术界近年来的一大动向。台湾中原大学曾庆豹的《阿冈本思想中的古典（神）学资源》注意到阿冈本（Giorgio Agamben）近期思想中愈加明显的政治神学关注——响应施密特（Alfred Schmidt）史密特的政治神学（例外状态）的相应，认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弥赛亚思想。这种关注使其与神学之间保持着富于创新性的清晰而又模糊的关系，概言之，即回到古典（神）学之中寻找论述的起点。曾教授在演讲中回溯阿冈本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牲人》（*Homo Sacer*），探究他的问题是什么，讨论后来的著作为何不断回到古典（神）学之中，比如，《帝国与荣耀》（*The Reign and the Glory*）、《语言的神圣性》（*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裸体》(*Nudities*)。曾教授还介绍了阿冈本在保罗及相关神学研究中，是如何响应当代政治话题的。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特雷弗·哈特教授在《圣灵降临之后的对话？对诠释学意向的神学冥思》(*Conversation after Pentecost? Theological Musings on the Hermeneutic Motion*)的演讲中，亲自实践了如何在研究中恰当地进行神学思考。任何翻译或诠释都是在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之中冒险。当重新想象圣灵降临时，为避免这种冒险，应将其视为象征自我(*self/same*)的超越与完成，而非他者(*otherness*)的消除。基于这一思路，哈特教授首先阐述文化与对话之间的关系，指出在跨文化背景下，对话既是有趣的，也是冒险的。其次，探究意义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讨论意义与现实、真理之间是否可以分离。再次，强调沟通的崩溃(*communication breakdown*)，即符号滑失(*the slippage of sign*)，是对话面临的又一风险。最后，分析“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奇特逻辑——通过想象策略，无条件与作为他者的他者(*the other as other*)啮合，冒丧亡之险倾空自我，坚信得以藉此矛盾地完成自我并真实地面对其特有身份——这就是哈特教授认为的跨文化、跨学科对话中的基督教逻辑。

跟随着十位主讲人，本期暑期国际研讨班重温古典学使命，辩读洪水神话，揭窠学科设立的深层真理，领略汉学译作的原貌，会通中西否定诠释学，定义“比较的时代”，梳理诸“瓦格纳”事件，倡议“重回神学思考”倡议，关注政治神学资源，探讨对话与“道成肉身”。以上种种跨文本、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深层互动，不仅为中西经文辩读提供了实践机会，也促使与会者不断探索人文学内含的自我“否定”和“反转”精神，并回到更深刻的神学逻辑之中去思考人文学与神学的共通之处。经由古典学的“批判”与葆养，人文学与神学的复杂关系在反复的相互观照中得以澄明，这不仅是本届，也是历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研讨班的标的与旨趣。